

从诸圣堂的创建看圣安德烈座堂  
华语教会早期宣教植堂事工（1967—1975）

安跃进 傅家辉 林思凯

导师：潘乃昭博士

科目：本地教会历史探究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10/10/2007

从诸圣堂的创建看圣安德烈座堂华语教会早期宣教植堂事工  
(1967-1975)

1. 引言.....	1
2. 早期座堂华语事工的基本概况.....	1
3.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本地政经局势,宗教环境.....	2
4. 宣教植堂异象的产生.....	4
5. 植堂过程的来龙去脉.....	4
6. 结语.....	7
7. 书籍/网讯/刊物.....	8
8. 附表说明.....	9
9. 访谈设计:刘得恩会吏长/林国兴牧师/刘焕章,刘焕莲姐妹....	10

(附: 访谈协议书三份及原始录音卡带)

## 从诸圣堂的创建看圣安德烈座堂华语教会早期宣教植堂事工（1967—1975）

### 引言：

马太福音 28: 19—20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离开门徒时留下的这个指示是教会向外传福音的动力所在，也是堂会向外扩展，开拓宣教、植堂事工的行动指南。作为圣公会在新加坡建立的第一间的堂会，圣安德烈座堂自然肩负着圣公会在本地宣教植堂的不可推诿的重任。单单就华语事工而言，圣公会从座堂 1954 年 5 月 9 日开始的区区六个人的华语崇拜为起点<sup>1</sup>，发展到时至今日拥有数千会友，二十六间堂会<sup>2</sup>，这诚然是上帝的作为，亦与圣安德烈座堂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作出的贡献息息相关。圣安德烈座堂中华国语教会成立时的章程在第二条列明了教会的宗旨：信奉基督教圣公会教义，推进宣教工作并计划发展教会事务<sup>3</sup>。这恰恰是对主的大使命的正确和积极的回应。座堂华语植堂事工从开始到现在经历了超过 50 年的历史变迁，当我们选择研究其宣教植堂历史的时候，早期诸圣堂的创建可以说是这一大脉络中的最佳的缩影。

### 早期座堂华语事工的基本概况：

要探讨座堂早期华语植堂事工，我们尚须对其本身前期的历史有个清楚的认识。座堂的建造历史，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与新加坡的开埠有密切的关系。只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以英语崇拜。在 1954 年首创华语崇拜的时候，与座堂 1834 年就开始的英文崇拜比较，整整相差了 120 年，华语教会的成立乃是迎合了当时客观环境的需要。1954 年吴德华会吏长及任教于三一神学院的霍碇博士看到了华语事工的异象，鉴于新加坡本土华族人口具多，而在华族

<sup>1</sup> 张欣盛等，《如鹰展翅上腾》，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2004，15。

<sup>2</sup> <http://www.chinese.anglican.org.sg>，浏览于 10/10/2007。

<sup>3</sup> 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教会，《十周年纪念刊》，1964，39。

当中能操华语的亦非常普遍，座堂不设华语堂会实属遗憾。他们遂征得时任会督的班亨利及座堂主任牧师的同意，选择以座堂纪念楼为崇拜地点，于 1954 年 5 月 9 日正式开始华语崇拜<sup>4</sup>。虽然第一次的崇拜仅有六人参与，但重要的是跨出的这一步揭开了圣公会华语事工的新纪元。转年会督班亨利派座落于樟宜路上段的圣公会中学校长黄仰英牧师接手华语事工的责任，继续华语事工的发展开拓。黄校长积极鼓励并推动圣中学生参加崇拜，随之参与崇拜的人数逐渐增长。之后因着需要设立董事会，由董事会成员并肩商讨会务，在教会管理层面亦取得进展。事工方面建立了教会一系列肢体如：主日学、妇女会、青年团契及查经班等等。教会日益壮大，原先的崇拜地点不足容纳，1959 年 3 月 1 日起改移在圣殿中崇拜。短短数年内，堂会由萌芽、生长到蒸蒸日上，及至郑新宪牧师在 1961—1964 年管理时，座堂主日华语崇拜人数平均已达 200 人<sup>5</sup>。堂会在经济方面，由于会友热诚奉献，除了行政开支，尚有盈余，教会特设立建堂基金以备未来之需，这笔款项在 1964 年华语堂会十周年庆典时已达 4 万余元<sup>6</sup>。这在当时来说，已是一笔不算小的数目，为以后教会向外扩展、开展植堂事工，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直到今天，当回头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为当时的先贤牧者们的远见卓识和竭力侍主的精神而深感钦佩。正如当时主教沈佰利会督所言：华语堂进步之迅速，在本教会来说，实为稀有之现象<sup>7</sup>。

###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本地政经局势、宗教环境：

教会身为整个社会群体中的一份子，它自然而然地与社会存有不可割裂的联系。研究教会的发生发展，显然需要厘清教会在当时当地的社会处境中的政

---

<sup>4</sup>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教会，《十周年纪念刊》，1964，2。

<sup>5</sup>张欣盛等，《如鹰展翅上腾》，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2004，15。

<sup>6</sup>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教会，《十周年纪念刊》，1964，2。

<sup>7</sup> 同上。

治、经济局势，文化背景以及宗教环境。

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的社会经历了几次骤然而多层面的演变。1959年它从英国的殖民地走向自治，1964年7月，新加坡发生了马来人和华人冲突的种族暴乱，1965年8月，新加坡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sup>8</sup>。刚刚独立的新加坡当时所要面对的困难重重，在非常渺茫的生存机会里挣扎求存。在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带领下的新加坡，一方面要在国际上谋求国家承认，一方面要尽快在国内稳定政治局势、建立经济体系。1965年到1970年间，新加坡处于发展工业出口阶段。由于新马分道扬镳，两者之间传统的经济联系被割裂。新加坡无法从马来西亚得到正常的原料供应，商品的销售市场也不可避免地萎靡。加之1971年英军从新加坡撤离，新加坡一下子失去20%的国内生产总值，且失去4万个就业机会<sup>9</sup>。1971年后的新加坡需要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经济的转型。国家的经济命脉的立足点是，通过贸易和投资，与世界主要工业国联系起来，同时致力于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在本区域转口贸易、提供服务和传播信息的枢纽。政府为此推行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和计划，由此带动了国内工业的成功转型，即使到1973年发生全球石油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物价高昂，新加坡也安然度过了这次危机<sup>10</sup>。

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体现了新加坡独特的多元种族文化背景。种族暴乱的惨痛事件促使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下定决心建立一个公平公正，不分语言、种族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社会。这亦为新加坡推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奠定了基础。基本上，七十年代前后，本地的福音工作没有受到政府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反而从很多迹象显示，福音更蓬勃发展。1969年，葛培理布道团来

<sup>8</sup>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第二次版，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142。

<sup>9</sup> 鲁虎，《新加坡》，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1。

<sup>10</sup>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第二次版，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8。

新加坡布道，在国家体育场举办了八场聚会，据统计，近 5 万人参与聚会，其中超过两千人决志信主或表示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1970 年，笃信圣经长老会邀请 Bob Wells 博士同样在国家体育场举办连续十个晚上的福音聚会，其中最后一场参与者逾 3000 人，更有大约 300 人决志信主<sup>11</sup>。可见当时政府的宗教政策很恰当地被实施，这在我们对受访者所作的调查当中也得到了证实。自由宽松的宗教政策带来了 1965—1978 这段历史的福音复兴。

### 宣教植堂异象的产生：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言 29：18）。“创建诸圣堂”——一座堂这个宣教异象的产生要追溯到 1967 年尾。1967 年 9 月，从澳洲深造学成回新的郑新宪牧师继任座堂主任牧师，负责推动华语部的工作。郑牧师看到座堂华语部的长足进步，从自立、自养后，不能因此而自满。他深受保罗“还福音债”的感召，从神那里得着非常清晰的异象，拓展神的工，创建一个儿女堂。他在和会督沈佰利及刘得恩会吏长商讨后，随积极地投入到策划和实际推动当中。经过可行性研究，与 1967 年底便选址在樟宜上段圣公会中学校址内计划展开五年布道的工作。1968 年为祷告预备年，在这一年里林国兴牧师被按立为牧师。之后教区华文部委任刚被按立为会长的林国兴牧师前往樟宜，具体实施郑新宪牧师的这项植堂计划。1969 年开始，肩负着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的牧者、董事部和弟兄姐妹的信心和负担，林牧师带领座堂一组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专责在圣中加强福音工作，并按部就班地推动植堂计划<sup>12</sup>。

### 植堂过程的来龙去脉：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成立十年后，其经济上已达到独立，便决定向外发展，推广福音工作。那时，教会深受多伦多圣公会总议会的宣言影响：『一个为自

<sup>11</sup> 孙耀光，《在他手中》，第二版，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2001，324。

<sup>12</sup> 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84，122。

己而生存的教会，会因自私而沦亡』。基于传福音的使命，在 1967 年华语部便逐步展开福音计划。经过一年的恳切祷告和积极的筹备，也凭着信心，华语部欲开拓新的里程碑，于是物色了位于樟宜路上段的圣公会中学为地段，承担发展樟宣布道的工作。其中之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当时的樟宜地区很少有基督教的堂会在那里做布道的工作，另一就是在圣公会中学有一千余师生可作为福音对象。若能够向这千余人传福音，进而藉着师生接触他们的家庭和邻近的居民，这将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果效。因此，华语部决定以圣公会中学为布道中心，展开布道工作。<sup>13</sup>

如前面也提到的，1969 年座堂华语部向教区聘请本堂第一位全时间奉献的青年林国兴牧师为副牧，并特派他到圣公会中学去推动这项福音事工，展开铺路的工作。当时他也兼任圣公会中学校牧一职。<sup>14</sup>1970 年，在林牧师和一群热心的弟兄姐妹如刘焕章、刘焕莲等等努力推动下，开办了主日学以及在每主日的聚会。参与慕道者多数来自圣公会中学学生以及一些住在樟宜地区的居民，当中有许多住在甘榜的家境贫寒的学生前来参与，目前在诸圣堂全时间服侍的潘于兰姐妹就是当年其中的一位。在 1971 年 4 月 4 日棕枝主日下午，首次在圣公会中学学校礼堂举行主日崇拜，崇拜人数达四五十人。<sup>15</sup>

在同一年，圣公会中学董事部将校园靠近大路地段慷慨地赠于建堂用途，于座堂华语部主任郑新宪法政牧师带领下筹建第一间儿女堂，并将之命名为『诸圣堂』。<sup>16</sup> 1972 年四月华语部接受了绘测师之设计蓝图，并提呈有关政府部门取得允可。经过一年多的波折，终于在 1973 年 10 月 21 日获得政府批准，

---

<sup>13</sup> 林国兴，圣公会诸圣堂建堂十周年纪念特刊 1975 - 1985 之刊首（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1985）。

<sup>14</sup> 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1984），19。

<sup>15</sup> 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三十周年纪念周刊（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2005），23。

<sup>16</sup> 圣公会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954 - 1994（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1994），21。

教会当时的反应是又高兴又忧虑。一方面很感恩设计蓝图被批准，一方面却也为预算经费的提高而担心。由于当时世界还处在全球性的石油危机当中，原本计划的 30 万元预算案已大大的不敷，建筑费用无可避免地增至 60 万元。<sup>17</sup>

在经费筹集上，教会得到李唐宝珮姐妹的慷慨解囊，她特别奉献了 30 万元。李唐宝珮姐妹时任座堂执事，她也是植堂筹建委员会委员及募捐小组成员。她向来热诚服侍，尽心爱主。她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积极动员亲友募捐。初期 1970 年诸圣堂开始福音事工，开办主日学，也经常举行福音营会。李太太就把李氏别墅借给教会办营会，同时为学生提供物质上的资助。从 1971 年 4 月 4 日开始第一堂崇拜起，她每个月都会自己亲带一批姐妹参与，从行动上为同工们给予鼓励。<sup>18</sup>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从我们对林国兴牧师的采访中得知，李太太不仅仅在建堂上给予捐助，也不遗余力地协助圣中贫困学生读书。当时，圣公会高中的学生和教会许多青少年都得到李氏基金的赞助。许多青年在其资助下完成大学教育，成为社会专才，对教会对社会作出了美好的贡献。

座堂也积极发动全体会众募捐，参与团契的学生也加入募捐行列，他们每个人都带一个扑满盒子用以为建堂存款。募捐小组在李钧光先生带领下，在全教会开展筹款工作，加之教会原本已有一笔建堂基金，终于在 1974 年座堂华语部筹足了数目。并于 5 月 5 日下午四时半在植堂选址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由黄仰英牧师主持仪式和周万一主教祝福基石。本堂兴建工程在郑新宪法政牧师及华语部主内同道群策群力的推动下，在建筑小组鼎立配合下，承包商用了一年的时间将建筑工程完竣。庄严肃穆的圣殿，于 1975 年落成正式启用，矗立在樟宜地区圣公会中学的旁边，献堂典礼由周万一主教主持。<sup>19</sup>

---

<sup>17</sup> 林国兴，圣公会诸圣堂建堂十周年纪念特刊 1975 - 1985 之刊首（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1985）。

<sup>18</sup> 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三十周年纪念周刊（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2005），36。

<sup>19</sup> 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三十周年纪念周刊（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2005），23。

座堂华语部秉承前人的异象，筹建了诸圣堂，成为教区华文部第一间全责向外植堂的教会。<sup>20</sup> 诸圣堂早期之会务都是由林国兴牧师负责。1974 年林牧师因到台湾进修一年，后由王明金牧师接替负责会务，在林牧师学成返国后，再继续由他主理本堂的事务。<sup>21</sup>

教会坐落在圣公会中学里面，因此圣公会中学成为诸圣堂的特有的福音工场。圣公会中学原本就是一所华校，后来也成为了一所特选中学，它一直以来都保留着优良的华文传统，这传统也是诸圣堂的传统。从开始至今，诸圣堂以华文为主，专向圣公会中学学生传福音，教会为圣公会中学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福音事工，包括中一和中二的圣经课，每周一次的全校周会，每年一次的学生营，学生辅导，初信栽培，团契聚会及活动等。<sup>22</sup> 至今，这些在圣公会中学的福音事工仍然持续，从来没有停办过。

### 结语：

诸圣堂的创建在圣安德烈座堂华语教会的整体植堂历史中，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里程碑，照作为其中见证人之一的林国兴牧师的话讲，诸圣堂实在是从“无”到“有”。审视这段历史的本身，从植堂事工的开始，就叫我们看到了上帝的计划和信实的带领。先辈们不畏辛劳，竭力为主拓展国度，实为华人堂会的祝福。诸圣堂的创建为后来圣公会的华语教会和群体作了可参的样板，带动了教区英文及华人方言堂会纷纷开设华语堂会，在这个层面讲，其早期宣教植堂的意义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值得我们一提的是，诸圣堂作为座堂培育的儿女堂，在以后的发展中，也竭力效法为主植堂，其一手创办的巴西立布道所如今已在 2003 年成为圣公会辖下新的牧区——圣安德烈社区教会，因着福音的缘故，成了众人的祝福。

---

<sup>20</sup> 同引上，19。

<sup>21</sup> 同引上，23。

<sup>22</sup> 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二十五周年纪念周刊（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2000），17。

## 参考书目：

孙耀光。《在他手中》。第二版。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华文组，2001。

圣公会诸圣堂《飞跃30》编委会。《飞跃30》。（三十周年纪念周刊，2005）。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鲁虎。《新加坡》。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教会。《十周年纪念刊》。1964。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第二次版。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

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1984。

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如鹰展翅上腾》。（50周年纪念，2004）。

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40而不惑》。（40周年纪念特刊，1994）。

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25周年纪念周刊》。2000。

林国兴。圣公会诸圣堂建堂十周年纪念特刊 1975—1985。新加坡：圣公会诸圣堂，1985。

圣公会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954—1994。新加坡：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1994。

网页：<http://www.chinese.anglican.org.sg>

## 附表说明：

**诸圣堂筹建委员会**

主席：郑新宪法政牧师

委员：林国兴牧师、姚瑞汉牧师、林建先生、刘石伟先生、周鼎先生、李唐宝琿女士、李钧光先生、姚关淑贞女士。

**募捐小组**

召集人：李钧光先生

组员：姚瑞汉牧师、林建先生、李唐宝琿女士、周鼎先生、周张斐如女士、刘石伟先生。

**建筑小组**

主席：李钧光先生

组员：姚瑞汉牧师、林建先生、陈子忠先生、欧仙松先生、布桂生先生、冯其信先生、陈少谦先生、李唐宝琿女士、刘焕莲女士、陈姚友利女士。

**建堂财政**

1971—1973 姚瑞汉牧师、刘石伟先生

1974—1976 萧葆翔先生、黄林杏初女士

绘测师：周振威先生

法律顾问：黎嘉才先生

承建商：廖星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专访林国兴牧师伉俪

时间：2007年9月28日晚上八时

地点：於林府

访员：林思凯，安跃进

访谈内容(经整理)

**问：**圣安德烈座堂是根据什麼基础考量这个异象，在圣公会中学或别的地方开始这个事工？

**答：**从1967年，藉着郑新宪法政牧师的宣教的异象，推动了这个事工，他的眼光看到圣公会中学，希望在那里开展传福音的事工。1967年，我做会吏的时候，（我）被派到善牧堂跟刘得恩会吏长学习（的时候），我从1967至1968年都在善牧堂事奉。

郑牧师在当时就有这个异象。1967年我做会吏时，他就邀请我到圣公会中学，去那边接触学生，教圣经课，所以68年一整年我都在那里教圣经课。在68年，郑牧师就有这个异象，向教区邀请我回到座堂帮助。但真正的时间是要我去发展圣公会中学的事工。

所以从1969年开始，我被调派至圣安德烈座堂作副牧，能够放比较多的时间在圣公会中学，在那里教圣经课、辅导工作、带领周会，在那里做传福音的事工。

从整个历史里面，虽然我们在1969年就开始这个事工，到70年才开始主日学。直至1971年4月4日的棕枝主日我们借用学校的礼堂举行第一次主日崇拜，讲员是刘得恩会吏长，他是当时的教区华文部主席。我们从1971年才开始主日崇拜。當時的主日学是借用学校的课室，主日崇

拜是借用学校的视听室。在这几年期间我们开始筹备建诸圣堂。1974 年建奠基，在 1975 年建成，由周万一主教主持。

问：在这个过程中，我想知道根据你了解的包括圣安德烈座堂、在教区的层面，包括会吏长和主教的策略如何推动这项事工？

答：教区的支持是她愿意授权给圣安德烈座堂开拓植堂这项事工，但是经济方面却是由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负责。但是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当时还未能付另外一个牧者的薪金，所以要求座堂的英文部帮助一半的薪金。座堂英文部也答应支持五年，五年後由座堂华文部全部负责。

问：如果我们按刘得恩会吏长说，当你被按立後，会吏长就把你派来圣公会中学专心集中负责植堂的事，是吗？

答：不是！刘得恩会吏长是在善牧堂。其实会吏是由教区按立的，之後派我到善牧堂。但是到 1968 年的时候，郑新宪法政牧师向教区提议邀请我回到座堂去发展诸圣堂。所以我在 1969 年到诸圣堂，那个时候没有堂会。只有学校，用一年的时间接触学生、教圣经课、主持周会和认识老师直至 1970 年。

问：牧师，在这一段过程里，有哪些同工和信徒领袖协助你？

答：那时候，有好几位，包括杨宜勤，有刘焕章、刘焕莲，（还有）周贤正，是我们的现任主教，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人。这几位都答应帮助教主日学，所以我们就有这一批人参与。

问：师母，我们了解到你当时也是在开始事工的时候，（你）也在参与教导。你可以回应这方面吗？

答：我只是教小六的主日学，好一段日子，有好多年，一直到有家长来参加崇拜。我也忘记了是哪一年开展成年主日学，我带领那一批家长的。

问：那时候的学生不单是来自圣公会中学的学生，是吗？当时也有住在附近的学生，是否也被邀请来参加这个事工？

答：有！一些周围的邻居。他们有去分单张。

问：那些都是比较穷苦的家庭，对吗？

答：对！在樟宜地区，住在亚塔屋，我们那时候去载他们。好像于兰他们，还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住在山坡上，亚达屋，要推轮椅。我们青年团契完后，吃午饭后就到樟宜去载他们。

问：当时教会在这宣教工作里，筹款如何进行？

答：筹款方面，主要由圣安德烈座堂的筹建委员会。郑新宪法政牧师是筹建委员会主席。我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的人。现在当我们看到名单的时候，只剩下三个人留在世界，那是郑牧师、我和刘石伟弟兄。其他的都回天家了，包括李唐宝珮姊妹。筹建委员会里的募捐小组，刘石伟弟兄。

问：听说李唐宝珮姐妹的支持和参与也是蛮多的？

答：她本来的目标，是要自己负责庞大的筹款和捐款。主任牧师说全部由经济能力强的人负起这个责任会使到教会没有责任感，像是靠他们。主任牧师认为再难也好，大家一起筹款会比较好，也建立归属感。那时候就劝她说我们要一起筹。

问：学生如何参与这个筹款？

答：做筹款的铁罐。每个学生拿回家，一个月後拿回来，然後再拿回去。从最小的，每一年级都筹。

问：关于李唐宝珮姊妹，她的其他事工？

答：她的支持力很大，她有一种鼓励性。她每个月都亲自参与这里的主日崇拜一次

问：依你看起来，当初建堂的筹募基本上还顺利吧？

答：基本上算是很顺利，那是上帝的恩典够用。因为当时的目标只是 30 万，后来在筹备的当中须要多一倍的费用。

问：当时教区、其他堂会、华文和英文堂会，对圣安德烈座堂植诸圣堂的反应怎样？

答：在举办筹款过程中，他们多半都有参与，包括我们的第一堂崇拜，几个华文部堂会都有来献诗，合起来献诗，表达他们的支持。

问：当时的宗教政策方面，政府采取了什麼态度？是保守还是开放？当时社会对宗教的态度？

答：当时政府对基督教蛮开放，所以我们建议建诸圣堂（的那个地方），其实那块地是属于圣公会中学的。所以我们经过律师馆，我们的律师黎嘉才，当年是律师，後来成为法官，我们透过他申请把那块地分出来，从圣公会中学分出来给我们，所以那块地就完全属于教会直到现在。

问：在过程中，牧师，你曾否遇到一些特别情况或印象比较深的？

答：很多学生，几乎是 90% 的非信徒学生。因为要主持周会，你有 90% 还未信主的学生，一定要有办法让他们有所领受，所以有一些圣公会的崇拜、礼仪需要改，诗歌也需要改。老师方面，当时有六位基督徒。圣公会中学里包括校长和老师共有六位基督徒。所以，你可以想象要向全部的学生传福音，这个过程，只有六位基督徒，怎样传福音？那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有目标，尽量让所有基督徒，已经当老师的，请他们转校，来到圣公会中学。后来达到一半的老师是基督徒，这是很大的祝福，给我们很大的力量。这些老师也慢慢在我们的周会、教导圣经课、营会，他们的投入也是一个祝福。

问：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当初从一个学生事工，传福音的对象到我们开始有正式聚会，那个时候是 1971 年。开始来的是学生还是有普通信徒？

答：开始时绝大多数是学生，不过有一些家长开始来。慢慢地，教区华文部在东部，因为当时东部没有教会，所以他们直接介绍到圣公会中学。就像张保华一家人，也是这样来的。

问：当初崇拜大概有多少人？

答：平均差不多有五十个。

问：师母，你能回忆当时在参与的过程中有什么难忘或困难的事或者是好的事，印象比较深刻。

师母答：我倒是觉得那时候，弟兄姊妹很同心，悦明、松明，有好几位。他们做行政，以前我们在华语堂（圣安德烈座堂）都是在早上崇拜后，下午就跟着上来，他们也奉献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牧师答：**这批人都是圣安德烈座堂华语部的，跟我们一起在青年团契长大，所以跟我们很同心。我们去布道，他们也跟着去，焕莲、焕章还是我的老同学，是中学同学，我们认识了几十年。

**问：**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当初是在东部的地方，教会很少。当初怎样考虑开办华语的教会，没有开办英文呢？

**答：**当初郑牧师他们认识到樟宜地区大都是接受华文（教育）的，受华文教育的多，所以开始这方面。

**问：**牧师，如果今天时间可以倒流回到当初，你会觉得在哪一方面更好的来调整整个堂会事工的开展？比方说有什麽遗憾，如果可以回头，可以做得更好？

**师母答：**倒不觉得遗憾什么，反而现在来做更容易，因为那个时候的根基，那个时候才困难。现在根基已在，学校的学生已这麽多。现在再努力一点，科技这麽发达，可以利用这些资源。

**问：**换句话说，你对过去所做的都不觉得有遗憾，也没有觉得可惜的东西。

**师母答：**不会啦！有很大的满足感！

**问：**那个满足感在那里？

**牧师答：**或者很缺乏某个方面的时候，看到上帝的祝福，几个人这样做，这样开始主日学。一个人这样开拓，以後的影响就看到。回头来看，前面的东西就没有什麽好遗憾！反而会觉得，我们能如此投入，就很感谢上帝用我来服侍。

**师母答：**回想一下，我是一直在感恩，以致象腾卫，于兰这一批，还有才显。从那时候中一开始，不是慢慢地长大了。很感谢主，他们一直在教会事奉，好几位成了牧师传道，这是上帝的恩典，保守带领着他们，这是我很感恩的。其实牧师可以多谈一点，就是后来在那一年的时候，这些学生开始参与这福音工作。因为当我们谈到这些人的名字的时候就想到这些人从福音工场出来服侍，他们怎样参与福音工作？献出什么东西？

**牧师答：**这是可能在学校带领周会，带领青年团契。青年团契是一个让学生参与的活动，那时候，青年团契很大，有三百人，那麽好像这一批人在初中的时候就接触圣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慢慢学习来事奉，从初中至高中，到高中的时候，他们在团契的时候，慢慢学习，所以到高中，他们成长了。他们成为团长、成为委员。那麽，他们带领学生团契，所以，其实圣公会中学有很多的青年人投入。

**问：**以前他们是去圣安德烈座堂崇拜，然後下去诸圣堂补习吗？

**答：**开始的时候，（后来在）诸圣堂崇拜。可能把两边拖了两年後，他们就比较注重说在诸圣堂。但是洗礼还是在圣安德烈座堂。好像于兰，他们受洗的名单记录是在座堂。

**问：**诸圣堂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答：**是 1975 年。

**问：**1975 年之前，教会怎麽样的情况？

**答：**1975 年後，严格来说，五年後，那个经济已经达到自己可以自养。

不过那时候，1975-1985年，1975年经济繁荣了，但在这个期间那些年青人的奉献还不是很多，后来成年人愈来愈多。

问：正式成为牧区，一个独立的牧区是….

答：89吧！1980年我们就自立，同时按教区的规则，我们有礼拜堂，成为堂会，如果你有能力自给自养，有权力成为牧区，但那时教区还有别的考虑，叫我们放慢一点，我们还属于座堂。半年后教区批准了，牧师就成为第一任牧正。

问：哪一天完成？

答：假如说儿女堂，诸圣堂是第一间从无到有的。

问：牧师的意思是指？

答：其他堂会，比方说英文部的堂会慢慢成立一个华文部堂会，可能是因为英文部会友的家长是华文源流，所以植堂倾向华文。但是诸圣堂不同，我们从头开始。开始要有几个方面的要求。第一，经济；第二，能力；第三，建堂。

问：谢谢牧师和牧师娘，（还有什么吗？）

牧师答：所以诸圣堂可以说是整个教区华文部向外植堂的教会！

（访谈结束）

## 专访刘焕章、刘焕莲姐妹

时间：2007年9月7日早8时

地点：于刘府

访问者：林思凯，安跃进，傅家辉

### 访谈内容(经整理)

问：你们一开始时是怎样参与这个事工？

答：一开始的时候便参与了，跟蔡月明姊妹、立伟的姊姊，还有松明他们，都是座堂的青年团，李丽芬姊妹，周贤正主教当年还未结婚、还未订婚。1970年正式开始主日学，还有林国兴师母，所以大概有七、八人做主日学老师。

问：当时主日学每班大概有多少人？

答：他们多数都是圣公会中学的学生，每班大概有四、五个人，共有三至四班。我们在主日学之前有补习，我们用补习跟他们说你们来我们有补习，补习了然後才聚会。主要是数学和科学。因为松明、悦明补习科学和数学，他们还学新数！我们读文科，只有三科。我们还是要去看书。主要是因为制度改变了，中学的时候要用英文，但是他们的英文不好，所以数学也是听不懂，所以需要人跟他们讲解，补习班便是这样开始。

问：是否有替他们补习英文？

答：英文科好像没有，

问：英文不好，但是没有补习英文…

答：没有这样人才。

问：所以起初我们就用补习这个策略来吸引他们来教会，然後给他们上主日学。

答：主要是为什麼要跟他们补呢？因为他们当时是初一中的学生都来自乡村，樟宜那边，他们没钱去补习。所以免费补习，每个人都愿意，求之不得！

问：时间大概是，从早上…..

答：不是！不是！那时没有。我们早上是在圣安德烈座堂崇拜，然後下午布道。所以布道的时候，我们先补习，然後才聚会。

问：在学校补习，所以他们来？

答：他们因为告诉家长去补习，家长不以为意，所以就让他们去补习，但是我们有聚会的。我懂，我们不是欺骗的，我们补习一个小时，然後接下来布道聚会。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崇拜仪式，就是用主日学方式讲故事，唱歌的方式。

问：那些学生是应当知道这个情况，还是没有关系，是圣公会中学的学生？

答：因为牧师在学校里教圣经课，所以可以号召他们：你们星期天是否要补习？如果要补习，数学有困难，要补习，你们星期天可以来补习。但是我们有一些圣经故事。他们多数是中一的学生，有时他们也带弟妹来，于兰就是中一的学生，带了她的妹妹于菊来，是小学的。她们喜欢唱诗，那么就带她来。那时候圣公会中学有圣经班，但是也有青年团。青年团一直都有的，从我们开始做学生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在青年团也有告诉他们这个讯息，就是我们星期天有聚会，可不可以来？所以一听，那个——翠珍。他们比较大一点就成为牧师很好的帮手。

问：你说早的时候已经有青年团，是谁开始的？

答：它是一项课外活动，它不叫青年团，是叫作学生基督徒团契。

问：我记得是由座堂发起的，那时是郑新宪牧师，可以告诉我们座堂是怎样推动这项事工？

答：其实，郑牧师是校牧。因为可能他跟当时的校长，陈校长有这个远见，可以建立这教会。我们因为有他，所以他就发起要建堂，因为当时郑牧师也在圣公会教主日学，林牧师也是。所以从这方面推动起来。不过，我记得不懂得是布道基金，还是座堂已经有一笔钱。怎样做？郑牧师比较清楚。林牧师当然也很清楚，他当时很年轻。

因为那时我们年轻，对这宣教概念不清楚。只是我们这几个青年团的人关系很好。后来在诸圣堂有了崇拜聚会以后，我们回到家几乎已经是五、六点。早上到座堂，下午回家吃饭后，就坐巴士上去。

问：我听说是早上崇拜以后，就到林牧师家，师母煮饭给你们吃，是吗？

答：那些是那些年青人。初期他们没有，应该是中四、高中的时候，他们也这样去。他们也参与座堂的崇拜，不是全部，倒是几个大的下去做崇拜，所以一起去林牧师家吃饭。就是于兰那一批，完了就上去。

问：这么说，那时候的主日学和这个补习班都是比较迟，因为早上在座堂崇拜…

答：对！两点开始补习，补习完了开始聚会。后来人多了以后，就没有补习班，开始便是崇拜聚会，崇拜完了就是主日学。

问：当时你们是否两边跑？

答：当圣公会中学的崇拜开始时是用视听室。那时，开始时就有张保华的父母。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怎样会来，他们就这样参加崇拜，也有成人，很不错！成人没几个，只有张保华父母。

问：刚开始崇拜是那一年？

答：1971年。

问：那时崇拜是由哪一位牧师主理？

答：林牧师，林国兴牧师已成为牧师了，偶然郑牧师有去，但是编排却不很清楚，讲道是否有请别人？

问：好像有，我记得那位王俊安牧师。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教会，但我们有学生营是六月或十二月，用李氏别墅。地很大！我们办学生营，帮助煮咖啡，准备面包，因为要省钱。用最多是李氏别墅，我们住在那些房间，大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个厅，可以坐几十人。五时多，于兰几个大的就起来帮忙。我们那时候做导师，饭吃也要准备，然后那个讨论也要带领。好一点是午餐和晚餐都是打包回来吃的。我们因为不是很多人可以在那边。我们两个比较多，林国兴师母也要做工。有一些，蔡月明，他们没有在里面睡觉，过夜，不方便。那些都是中一中二的学生，都是圣公会中学的学生。

问：只有中一中二，没有中三？

答：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中三？因为中一、中二才有圣经课，林牧师才会请他们，中三没有，没有机会请他们。

问：当时的学生中，现在还留在诸圣堂的，有谁？

答：仍然留在诸圣堂的只有我一个人。

问：在圣公会里服事的，或是其他的学生？

答：有几个学生成为在诸圣堂做执事的，张念中。但是这两年很多人都退了，那位做财政的为德，还有罗华基，他与我们服侍两年，还有去教补习，他是比我们迟一点才加入。那时候的学生现在成为牧师或传道的，第一批有黄腾卫、黄伟良，也有在别的教会做牧师的，张克福牧师。

问：带领你们的都是林牧师？

答：林牧师从头到尾都带领补习、主日学。主日学课程，因为没有钱，所以剪贴起来复印给学生。因为不是太大量，只有几位学生，所以也没有向教会要钱。买一本是很贵的，教师本也需要买几本。那个过程不是很有系统，如采用现成的教材学生都会不习惯。我们也没有受主日学教育，我们信主也只是在等校车时的空档聚会。对圣安德烈座堂的主日学也是不完整的。我们无从找到那些资料。凭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所以开始只讲耶稣的生平，有东凑西拼的感觉！

问：是否有采用道声的材料？

答：有一点，也有一点是用旧的。不过后来也有一点大卫王。

问：因你说要剪剪贴贴。

答：旧的！有些是儿童主日学的资料，所以把它们两课合成一课才可以！

问：刚刚那个时候因政府政策从华文转至英文，对英文掌握不是很好的，所以为他们补习。这样对学生的冲击是怎样的？

答：那时候还未有到政府改变学校。问题是那些学生小学读华校，圣公会中学是华文中学，但是英文程度也很高。课本如数学、科学用英文，是这个原因。政府改变的是在 1980 年。那时历史、地理用中文；数学用英文，而别的学校用中文。中三才分文、理科。

问：是否有向其他教会学习这些学生工作？

答：从前的交流是非常广的，我们在很多周年聚会，我们都邀请卫理公会、长老会的青年团契到圣公会中学去，有一百多人参与。我们有跟其他堂会交流。

问：这麼说，以前的学生团契是蛮热闹的，所以圣公会中学并非第一间学生有学生团契。有去其他教会学习、交流吗？

答：很少去别的堂会学习。在圣安德烈座堂已经有青年团，在学生团也有教牧带领，他们会给意见，应该怎样做。那时候，很强呢！已经有主席、副主席、财政、文书，有组织。那时候，郑牧师对组织很注意。我们每星期请讲员，要发邀请信给讲员，要出通告，写海报贴起来。

问：补习班的学生都不是信主的？

答：只是来，有兴趣才参加主日学。

---

问：既然有学习的困难，为何圣公会中学的基督徒青年团契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答：可能是学业成绩不差，所以不需要补习。

问：那些来自乡村的主日学学生的背景是怎样的？

答：有的没有人照顾，我记得有一个是患上小儿麻痹症的，要坐轮椅来。

问：当时圣公会中学学生的家庭背景是怎样？

答：也有一些从印尼来的，很有钱。

问：当时李太太是座堂的会友，她参与的过程是怎样的？除了付出金钱以外，还有什麼参与？

答：她亲自去选择那些材料，材料都是她找。她每一个月都来看看。

问：她有没有参与教导？

答：她没有参与教导。所以她是比较在精神、金钱和奉献上的支持，好像让我们去她的别墅。

她是在美国的大学毕业的，所以她很有知识。那个年代读大学的很少。  
所以在董事会里她是很资深的，跟牧师的配搭很密切。

问：当时郑牧师有特别的支持吗？

答：我们的财政来自圣安德烈座堂，他全力支持，我想他是很重要的一员。  
林牧师好像有点拼命策划活动和建堂的过程，和郑牧师配搭。

问：关于建堂筹款的情况是怎样呢？

答：当时每一个主日学生都分发一个罐子，每天放一些零钱进去。

问：有没有好像现在公开卖旗筹款？

答：没有，这些都是内部的，没有公开。

问：有没有向其他圣公会堂会筹款？

答：我不知道，可能有。

问：圣经课是因为圣公会中学是圣公会的，所以有这一课，而并非政府要求的？

答：最好你没有。

问：建堂的时候的宗教气氛怎样？

答：那时候一班信主的只有三数个，他们的背景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即使参加主日学补习班，也不敢穿得整齐，就只穿拖鞋来，装作我们去玩嘛！因为圣公会中学是教会办的，所以没有严格限制，好像当时教会办的英校一样。那时没有种族纠纷，是教会出钱，所以教会有权去开始聚会，所以每星期有周会，没有觉得学校宗教活动受到干涉。我们上课的时间也比别人长，因为要把圣经课放进去。虽然每星期只有一节圣经课，但是要使每天的时间都长，所以别的课也要增加，而华文课比别人多一节。陈校长的立场为什麼不可以教？我们是教会传教，否则办来干什麼？他在教育部的名声很大，立场很坚定！所以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问：还有什么吗？

答：没什么补充了。